

春风化雨六十载 砥砺奋进新时代

——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启示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

内容提要:民主改革后,西藏大量建设现代学校,实行现代教育制度,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完善现代教育体系,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显著提升。双语教育深入推进,促进了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增强了各族群众教育获得感。队伍建设常抓不懈,建立了一支整体素质能力较强

的教师队伍。教育受援成效显著,内地办学成为西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解除束缚教育发展的桎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西藏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

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形成了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教育发展路子。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极大地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宣传党和国家政策、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增进民族团结、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促进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藏教育60年成就

(一)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党的领导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民主改革6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教育系统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教育系统“八五三四”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不懈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斗争教育,突出加强马克思主义“五观”“两论”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感恩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紧密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创先争优、“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四讲四爱”“三联三进一交友”“过好当下幸福生活”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教师坚持不懈加强党性教育、强化作风建设,培育良好师德师风,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宗教消极影响,过好当下幸福生活,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

(二)发展能力从弱到强,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1959年,西藏有各级各类学校468所,其中小学462所、普通中学4所、职业学校1所、中等学校1所,在校生19764人,在职教职工622人,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尚未起步。民主改革后,西藏大量建设现代学校,实行现代教育制度,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完善现代教育体系,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显著提升。截至2018年底,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2442所,教学点164个,其中普通高等学校7所、中等职业学校11所、中学133所、小学809所、特殊学校5所、幼儿园1477所(不含附设幼儿班206个)。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数78.25万人,其中高校在校生37833人、中职生

22817人、高中生61702人、初中生129405人,小学生326334人、特校生912人、在园幼儿123333人,区外西藏籍在校生80134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77.87%,小学净入学率99.5%,初中、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51%、82.25%、39.18%。

基础教育蓬勃发展,以公办为主的普惠性学前双语教育网络基本建成,“5个100%”扎实推进,全区所有县区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62个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建立了以中职为基础、高职为重点、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近五年来,已累计为全区培养输送技术技能人才5万余人。特殊教育体系基本形成,自2000年拉萨成立西藏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后,山南、日喀则、昌都、那曲也先后建立了特殊教育学校。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围绕高原科学与技术 and 民族优秀文化两大学科群,按照优势、特色、急需三个层次,不断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积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西藏大学进入部区合建高校行列,生态学进入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行列。西藏民族学院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学院更名为西藏藏医药大学并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高校空间布局不断优化,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建设稳步推进,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三)双语教育深入推进,促进了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西藏现代教育从起步开始即坚持双语教育,全面普及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的双语教育,巩固完善双语教育体系,提高双语教育质量,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水平,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大力维护了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同时开设藏语文课程。在幼儿园加大藏汉双语听说训练课程比重,强化藏汉双语听说能力训练;中小学起始年级道德与法治、历史、语文课程全面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在小学开展加强藏语文、汉语文、数学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学生基本能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初高中巩固提高汉语授课水平,加强藏语文教学,强化理科和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双语学习能力;在西藏高校,除藏语言文学、藏族传统文化艺术、藏

医药等相关学科和专业外,还开设藏语文基础公共课。

加强双语教育教材和资源建设。1960年,西藏成立教材编译组(现自治区教材编译中心),开始承担双语教育教材编译等工作,提高双语教材编写、翻译质量,通过开发、译制、引进以及资源共享等多种途径,有计划地开发满足双语教育需要的学科资源、专题资源和地方特色资源,双语教育资源不断丰富,促进双语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目前,自治区已编译各类教材400多种,收集12类学科的名词术语2500余条并已用于新教材及各学科教学中;编写了整套农牧区双语幼儿读物,开发了小学各年级藏语文、数学、科学、藏汉双语版多媒体教学资源,农牧区学前两年幼儿教育多媒体教学资源,用卫藏、康巴、安多三种藏语方言制作70多部经济作品和优秀出版物。据统计,自治区各级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80%以上的藏族公务员和干部职工,都能做到藏汉语互通;在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技术人员占76%,他们同样藏汉语互通;很多农牧民受益于藏汉语互通,成为农牧区脱贫致富带头人。

(四)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增强了各族群众教育获得感。党和国家对西藏教育采取特殊优惠政策,健全完善以国家投入为主的教育保障体系,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全面保障各族群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投入从1959年的不足200万元增长到2018年的243亿元,教育累计投入1718.54亿元,“十三五”以来财政教育投入年均增幅20%以上。1985年,自治区对义务教育阶段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穿、包住(现为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经过18次提标,“三包”年生均标准目前达到3720元。2011年,自治区全面实现15年免费教育。2012年,自治区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生每天3元,2014年起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并提高到每生每天4元。建立健全学前至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目前各类资助政策和项目已达40项,2018年教育资助资金达到31.54亿元、受益学生达到165.34万人次,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标。

教育公平公正的机制不断完善。落实招生和就业惠民政策,实施阳光招生,确保考生合法权益。实施国家专项计划、重点高校专项计划和农村专项计划,深入推进阳光招生,实现平安高考。2018年,农牧民子女高考录取比例达75.4%,并向人口较少民族和那曲、阿里等艰苦地区倾斜,内地西藏班初高中农牧民子女录取比例达到70%。认真落实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健全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创

业典型案例宣讲活动,2018年我区高校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0.05%。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2017—2018学年,自治区财政共计资助建档立卡(含农村低保)大学生9815人,落实配套资金4101.43万元。2018年落实深度贫困县学校基本建设资金达到19.06亿元,实施学前和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建设项目421个,投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学校配套建设资金8.38亿元,实施双语幼儿园项目83个、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50个,搬迁群众子女就近就近接受学前和义务教育得到有效保障。

(五)队伍建设常抓不懈,建立了一支整体素质能力较强的教师队伍。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自治区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实施“强师德、补数量、提质量、重管理、保待遇”五大工程,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广大教师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积极性显著提升,教师数量、结构、能力等都发生实质性变化。2018年底,全区在职教职工数由1959年的622人增加到53835人,增长86.55倍,专任教师平均学历合格率98.4%,基本形成一支政治素质过硬、数量基本满足、结构和水平基本适应教育发展的教师队伍。

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完善中小学教师师德评价体系,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大力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按照海拔高度和艰苦程度,实施差别化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逐年提高补助标准,目前已提高到月人均1000元,惠及1.7万名乡村教师;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将原本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统一为初、中、高级,设置正高级职称,打破了基层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天花板”;建立健全教师荣誉表彰制度,对乡村学校任教满20年、25年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推行“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试点,教师队伍的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和荣誉感不断增强。

(六)教育受援成效显著,内地办学成为西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教育事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作出在内地举办西藏班(校)的重大战略决策。1985年9月,以藏族为主体的首批西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学习,开启西藏教育新模式。2010年,在内地48所中职学校开办内地西藏中职班。截至目前,有20个省市75所中学举办西藏班(校)或招收西藏散插班,12个省市的33所学校举办中职班,196所高校招收西藏班学生,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3万余人。内地办学33年来,为西藏培养输送5.6万余名各行各业建设人才,已成为西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

出“要加大教育援藏力度,重点加强与数理化学科为主的内地教师进藏支教”。2016年4月正式启动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以来,在教育部等部委的直接推动和对口支援省市、单位的倾力支持下,内地17个省市和30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共选派1276名教育管理干部和专任教师进藏支教,西藏选派三批共1179名教育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赴内地跟岗学习,东中部7个职教集团、13所民办本科学校对口援助西藏7市地职业教育机构,目前,西藏已形成高等教育集团式、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基础教育组组式、教育部直属单位对口援助的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育受援体系。

西藏教育60年改革发展的启示

回顾西藏教育60年改革发展历程,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借鉴,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需要长期坚持。

(一)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经过民主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西藏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保证。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解除束缚教育发展的桎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西藏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未来。

(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教育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着力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努力让每个人都能人生出彩的机会。

(三)必须坚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及时研究解决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必须坚持党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相结合。西藏教育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央的特殊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也离不开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必须既用好来自中央特殊支持政策和对口支援优势,又充分调动全区教育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求真务实,攻坚克难,推动西藏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教育承载着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承载着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面对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做好教育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西藏教育系统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贺信精神作为根本要求,大力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坚持改革创新,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最近,笔者阅读了《黑格尔历史哲学》《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等关于历史学的理论著作,感悟颇深。

一、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交错

偶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决不能忽视,因为任何一条必然性法则不可能覆盖全部历史,如果否认了偶然性的存在,历史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历史的偶然性有其独立存在的条件和价值。但历史绝非由偶然性因素支配,历史的必然性仍然主导着历史的演变,它是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性东西,靠无数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对历史的发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作用。不管有没有巴士底狱事件,法国大革命依然要爆发。不管有没有波士顿倾茶事件,美国独立战争依然要爆发。不管有没有陈圆圆,明朝气数已尽、无力回天,无论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关东的清军,鼎革换代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有没有亚罗号事件,鸦片战争依然要爆发。不管有没有马嘉理事件,帝国主义早已蚕食老态龙钟、不堪一击的清政府。不管有没有巴黎和会,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文明示范”齐头并进下,已经或多或少卷入世界现代化洪流中,从洋务运动器物层面变革到戊戌变法制度层面变革,再到最后五四运动观念层面变革,已成为历史趋势。不管有没有擦染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在当时传统势力的倾轧下,最后与西藏革命党等其他主体发起的改良尝试殊途同归,结局都走向失败,西藏传统结构和保守势力对系列改良措施建立的防御工事及展开的强势反攻都具有相似特征,是系列改良尝试必然导致失败的原因,擦染事件只是催化了失败的进程。

二、历史是求真与致用的统一

历史兼容过去和现在,是求真和致用的统一。历史既是一面透视镜,能透过时光的隧道回到过去;又是一面反光镜,能以史为镜、以史资政。正是因为历史兼具求真和致用的双重属性,所以现在的历史学逐渐分化为“基础历史学”和

从唯物论角度研读历史学理论著作

丹增珠杰

“应用历史学”两种二级学科。如果求真压倒致用,历史研究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漫无目的、随波逐流,历史就失去研究价值;如果致用压倒求真,结果会使史学丧失自主性,地位岌岌可危。

历史的求真作用。班氏父子提出的“实录”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达到了自觉。班彪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朝乾嘉考据学派将求真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所以具有极高的文献参考价值,是因为吐蕃从松赞干布起,非常重视王朝史事的记载,在王朝中专门设立记事官和执掌官廷府文书,他们忠实记录历史事实。史官在撰写历史时,摆脱神话色彩,对历史坚持求真、客观、严谨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人文主义史观。因此,在史官笔下记录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研究吐蕃史最重要的“一手王家档案”。历史追求求真毋庸置疑,但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应该与现实世界充分联系起来,毕竟一切历史都与当代相关。乾嘉考据学派在大兴“文字狱”的时代背景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证古书上,改讹文、补脱文、删衍文,对旧史进行改作、补作、校注、辑佚和辨伪,不分巨细、不厌其烦。他们沉醉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不能自拔,丧失了历史的致用价值。

历史的致用作用。“帝王览史以励志,人民读史以励行”,历史具有积极的致用作用。尽管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创新为现实和历史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这道鸿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搭建桥梁,

历史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现实服务。

历史的致用作用是多面的:它不仅可以保存人类的集体记忆,维系人类生存的连续性;它也是民族认同的大熔炉,可以强化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延续民族传统的血脉传承;它还可以维护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因为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历史,都不会赞美任何意义上的暴力、仇恨、独裁、屠杀等,这是人类普遍遵守的基本价值尺度。重要的是历史具有为现实服务的作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作为一种鉴戒之学,一直发挥着它的致用作用。

三、文史不分家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优美的叙事是历史著作的装饰品,点缀、粉饰、装扮枯燥乏味的历史,赋予封尘的历史新的生命力。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是中国历史文学作品当之无愧的泰斗。反观西藏地方史,与之媲美的有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作者用词古雅,精心于文词的修饰,文笔明丽,是一部文学佳作,但又不至于对事件的严密梳理,对史料的严谨考证,能够熟练自如地运用所掌握的史料,同样不失为一部历史巨著。所以,历史与文学并不绝缘,它们之间并没有鸿沟,历史与文学之间是可以相辅相成、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

当质胜文的时候,历史就显得枯燥乏味,只是史料的堆砌;当文胜质的时候,历史就显得空洞华丽,丧失了历史的基本属性,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当文质相当时文史一家的精髓才能在著作中发挥极致,使得著作兼具历史、文

学的双重属性,以验今人。

四、事实义的辨析

“事”是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是一切历史记录和综合叙述的基础,但它又是离我们远去且不为人们所知的往事,这种已经消逝的往事,只能通过被描述的历史而重建,只能通过文献的考证(证实、辨伪)、校勘和与不同文献的对比,以及对史料记载人信用和能力的考察来接近。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其著作《历史学十二讲》中提出:“所有的考证方法都要回答如下一些简单问题。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资料是如何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作者是否真诚的?他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歪曲其证言?他说是的是真的吗?在他所处的位置上是否能够掌握真实的信息?会不会有什么偏见?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真实性考证针对证人或明说或隐含的意图,准确性考证针对其精确程度。前者要戳破谎言,后者是要指出错误。”

“文”是历史叙述,也就是被描述的历史,它是历史过程、历史现象的载体,是通过筛选、组合、描述混沌无序的、作为本体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对其建立具有一定逻辑的序列,使读者更加容易接受、理解、解读。编年体以年代为序列,纪传体以人物为序列,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序列,典志体以制度为序列。以敦煌吐蕃文献为例,PT1288《吐蕃大事纪年》遵循编年体史书的规范,PT1287《赞普传记》具有纪传体本书记述的风格。此外,西藏传统的历史叙述体例自成体系,有教法史(著作有《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等)、王统史(著作有《如意宝树史》《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等)、个人传记(著作有《热译师传》

《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颇罗鼐传》等)、世系史(著作有《朗氏家族史》《萨迦世系史》等)、史册(著作有《红史》《青史》《白史》等)、地理志(著作有《后藏志》《瞻部洲志》等)、寺庙志(著作有《大昭寺志》《塔尔寺志》等)、行路指南书(著作有《印度指南》《香巴拉指南》等)、年表(著作有《佛历表》《大事年表》等)。

“义”是史学的灵魂,为要中之要。历史观就像血液和细胞一样,为历史的骨架赋予鲜活的生命,使历史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正所谓“史学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历史观在历史三要素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封尘的历史植入人的思想、人的意识、人的情感,迸发出作者的思辨之花,流露出作者的真切情感,使得历史变得具有故事性、思想性和哲理性。后现代主义在否定和批判中确立自身,怀疑历史的进步性,反对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础、中心、视角,以持续不断否定、摧毁为特征,破除权威,提倡多元,将中心变成边缘,系统变成断裂,整体变成碎片,意义变成虚无。佛教后弘期开始,宗教在藏族史学中具有主导地位,传统的史观总体而言带有浓厚的神权历史学或宗教历史学的色彩,藏族史料著作价值分类中最有意义的历史是宗教史,其次才是地方王统史。这是因为藏族史学家多数是宗教信仰徒,在其著作中有意渲染宗教,体现出对宗教历史观的执着。总之,历史观为历史赋予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使历史得以百花齐放、洋洋大观,构建了博大、丰厚、绚丽、多彩的历史资料宝库。

(作者为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